

王维礼 著

中日战争15年 及其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日战争 15 年及其他

——王维礼学术论文选集

王维礼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战争 15 年及其他:王维礼学术论文选集/王维礼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9

ISBN 7-5073-0864-2

I. 中… II. 王… III. ①日本-侵华-历史-研究-1931~1945-文集②中国-现代史-研究-文集

IV. K1 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956 号

**中日战争 15 年及其他
——王维礼学术论文选集**

著 者 王维礼

责任编辑 张文和

封面设计 张 戈

版式设计 郑 刚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销售热线 63097018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金钊排版中心

印 刷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

装 订

850×1168mm 32 开 11.5 印张 28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1—3000 册

ISBN 7-5073-0864-2/K·351 定价:2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王维礼教授是中国现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是一位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

从本世纪 50 年代起，王维礼教授就在中国现代史这一领域里耕耘，迄今已有 40 余个春秋，他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现今已是桃李满园，硕果累累，王先生的弟子们，包括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遍布塞北江南和大洋两岸，大多数已是颇有造诣的学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禁区逐渐打破，学术气氛日趋活跃，全国性的中国现代史学会应运而生，王维礼教授是该学会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承担了学会的策划和组织工作。后因身体和年龄关系，王维礼教授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东北地区的中国现代史学术活动上，从 1990 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东北地区的中国现代史学术讨论会，每次会议均公开出版了论文集，使东北地区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氛围空前浓厚。这些，都是与王维礼教授的亲自策划、直接领导密不可分的。

王维礼教授从青壮年到古稀之年，在从事教学和社团工作的同时，一直笔耕不辍，讲坛上显现出的学术造诣，也同样溶注于其科学论著中，单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蒋介石和他的文臣武将》、《中国近百年名人传》、《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多部专著，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不乏学术精品和独特之点，这里选编的 30 篇文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即反映其研究特点的有关文章。

本书选编的文章，均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20 年间公开发表过的，在编排上，以反映作者研究特点为原则，依文章内容适当

归类集中，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早在 80 年代初，作者在中国现代史学会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现代史讲习班讲课时，从探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入手，就公开提出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端，向传统的“八年抗战”说提出挑战，首倡抗日战争“十五年”说。接着，又就这一问题连续发表文章，予以深入研讨，并与有关论点展开争论。与此相联系，作者又提出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共两党的政策问题，对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予以科学的阐释和评说。同时，作者对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中国的四强地位等问题以及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与中国政治前途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新鲜观点。本书选编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共 10 篇，它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化过程和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开端和抗日战争“十五年”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形成史学界的一家之说，作者是此说的始作俑者和主要代表者。

近年，作者还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种种言行，撰文总结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批驳日本右翼分子的主要谬论，剖析其主要特点，警示人们要以史为鉴以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本书选了 4 篇，是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之社会功能在当今的具体体现。

二是关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建国后的相当时期，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学科的研究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此时，王维礼教授以相当的精力投向了这一领域，发表了有关现代中国爱国主义历史经验、关于中国革命转变的理论和路线等方面的论文，同时，策划编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专著，并将亲自撰写的有关内容在中国现代史学会主办的讲习班讲义上公开

发表。1984年6月,《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建国以来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首次出版的这方面专著。王维礼教授是这部专著的策划者和主编之一,在统稿工作中负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还亲自撰写了第二章,对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政派的政治思想给予了科学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书选编了这方面的文章共5篇,其中3篇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第二章的一、二、三节,题目有所改动。选编的这部分文章虽然不象第一部分那样多,但它却凝聚了作者的开拓精神,他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另两位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林茂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一起,填补了这一学科专著的空白,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开拓者。

三是有关历史人物的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过,就迎来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此时,人们正在开始挣脱“左”倾思想的枷锁,史学界打破禁区、拨乱反正也还刚刚起步,虽说是提倡解放思想,但思想上的乍暖还寒仍是比较普遍的。在此情况下,王维礼教授却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发表了《陈独秀评价的评价》一文,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匡正了以往陈独秀评价中的偏颇之处,它同其他学者的同类文章一起,开了正确评价陈独秀的先河。这篇文章受到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重视,收入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王维礼教授也是较早打破历史禁区、对瞿秋白做出公正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79年开始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明确提出“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充分肯定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批驳了林彪、“四人帮”对其所加的诬蔑之词,同时,也客观地评述了其“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对其《多余的话》,既批驳了极“左”时期将它与《李秀成自述》相提并论,视为叛变投敌的“自白书”,又不同意将它说成“有令人夺目的光辉”,而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是思想上

政治上的错误，并剖析了产生这一错误的根源。王维礼教授关于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评价，既做到了“拨乱反正”，又坚持了“拨乱而不过正”，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多家报刊转述或推介。本书选编了关于陈独秀、瞿秋白研究的文章共5篇，同时收入的《中国现代史人物评价问题刍议》一文，实际上是关于中国现代史人物评价“概论”的浓缩，带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和清除极“左”思潮的战斗精神，尽管有些提法留有时代的印迹，但所论评价现代历史人物的前提、基本要求、主要标准和尺度等问题，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和普遍意义。王维礼教授在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就是较早的突破禁区、拨乱反正，充溢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能任意改动历史资料》一文涉及到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李立三在安源大罢工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强调了“拨乱反正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故也编入到这一部分。此外，有关方志敏、刘伯坚和王希天（作者为王希天研究会会长）等历史人物的文章，也一并编入。

本书选编的文章，均由作者本人提供原件，由编者编排并做适当技术性处理，其中有几篇是作者分别与杜文君、高二音、程舒伟等合作撰写的，特此说明。

编 者

1999年12月·长春



王维礼，1928年11月生，辽宁绥中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专著有《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现代史大事纪事本末》等多部，学术论文《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数十篇。

221 9

目 录

前 言	(1)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
论抗日战争的开端	(10)
论七七事变的意义	(26)
——纪念七七事变 50 周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	
国共两党政策研究	(32)
关于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若干问题	(48)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研究	
——兼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地位	(64)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	
评价	(81)
抗日救亡与“安内攘外”	(95)
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与中国政治前途论纲	(103)
国共合作与抗战建国	(119)
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	(133)
历史反省与“光明的日本”	(149)
攻击教科书的逆流与藤冈信胜	
——日本政治右倾化剖析之一	(164)
以史为鉴与中日友好	(176)
现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经验	(188)

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	(201)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及其理论意义·····	(210)
军阀争斗和“联省自治”的政治思潮·····	(225)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242)
陈独秀评价的评价	
——兼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历史地位·····	(259)
评瞿秋白和《多余的话》	
——兼与《重评“多余的话”》商榷·····	(274)
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	(282)
再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30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瞿秋白·····	(311)
中国现代史人物评价问题刍议·····	(316)
不能任意改动历史资料	
——与彭江流同志商榷·····	(331)
重读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	(334)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的刘伯坚·····	(338)
纪念王希天 学习王希天·····	(344)
论王希天的历史地位·····	(351)
后记·····	(360)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 社会的主要矛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还是史学界通常认为的中日民族矛盾只是“开始上升”？这一问题关系到如何认识1931年9月至1935年间中国社会历史主题以及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及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性质。本文试图论证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深入一步认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状况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表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事件”或“局部事件”。它“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①，即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灭亡中国的阶段。

第一，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即以武力灭亡中国阶段的开始。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基本国策。为实现对外侵略的目的，日本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扩充军备，加强对国民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制造侵略舆论。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清政府一败涂地，日本攫取了台湾和澎湖列岛，并把侵略势力伸入到辽东半岛。1904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进而夺取了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许多特权，使其占领东北、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欧美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扶植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9页。

阎张作霖，并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心理，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此后虽经1922年华盛顿会议重新确立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共管”，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事实上已为各国所默认。直到1927年，日本对华侵略活动从未稍止。在此期间，日本的基本政策是以武力为后盾进行经济侵略，但还没有达到以武力独占中国的阶段。其阶段性变化的关键，就政策制订而言，是1927年的东方会议；就政策实施来说，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27年6月，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加紧推行侵略政策。1927年的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提出了“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积极方针”。^①它标志着急进的武力吞并“满蒙”、征服亚洲大陆的“田中政策”取代了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蚕食中国的“币原外交”。东方会议的核心就在于“把满洲从中国本土中分裂出来”^②，并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基本方针。会后，田中在上呈天皇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了“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基本国策。《田中奏折》的真伪可以讨论，但《田中奏折》中所阐述的政策，已为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此后，日本侵华步步升级，1928年5月，日本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6月，在沈阳皇姑屯炸死张作霖。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寻求出路，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快了侵略步伐。它们大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舆论，鼓吹日本与中国东北的“特殊关系”，否定中国对东北地区的领土主权。关东军为了制造在满蒙使用武力的机会，从1931年5月到6月，一直推行蒙古独立运动计划和间岛暴动计划^③。虽然这些计划未能实现，但借口“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煽动仇华排华情绪，却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试探性预演。最后，终于制造了“柳

①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101—102页。

② 〔日〕小浦贯一：《森恪》第32页。

③ 参见〔日〕西乡桐作：《板垣征四郎》第157页。

条湖事件”，悍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这既是日本大陆政策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日本侵华政策进入公开武装侵略阶段的战略性起点。从此，中日两国间开始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战争。可以说，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成为中国社会中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第二，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超过了中华民族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处于帝国主义共同控制和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不能不存在着矛盾，为了维护它们的共同利益，在相互承认实力对比条件下，必然寻求和保持对华侵略的“均势”。1899年，美国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旋于次年3月为列强所接受，使“均势”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格局。在这期间，虽然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日本）曾一再企图打破这种均势，但由于实力的对比和列强间复杂的利害关系，形势又一再被拉回到“均势”局面。1905年的“三国干涉还辽”和1922年《九国公约》的签定，都是非常明显的例证。然而帝国主义的矛盾毕竟无法调和，所谓“均势”，归根到底只是对实力对比的认可。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在华势力急剧膨胀，为了实现“大陆政策”的侵略蓝图，它势必要打破列强在华的“均势”。九一八事变正是日本要以武力独占中国及列强在华均势被打破的标志。从中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日本以武力吞灭中国的行为，使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超过了中国与其他列强的矛盾，而成为最突出的矛盾。当然，九一八事变后，帝国主义列强仍企图挽回被破坏的均势，美国史汀生提出的“不承认主义”和李顿调查团的“国际共管东北”方案，就是这种企图的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已经在远东处于优势的日本，再也不愿充当二等伙伴的角色；囿于1929年以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列强对远东事务无暇东顾；再加上列强抱有日本进攻苏联的幻想，因

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对日本采取了静观事态发展的纵容态度。这就更加助长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

第三，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形势，这种形势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规定和制约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势。

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也从未把它看成只是与地方政权的冲突，只是“局部”性和“地方”性的事件，而是把它作为推行“武力灭亡中国”根本国策的关键性一步。当时全中国各阶层人民，也没有把事变看成是一个“地方事件”。十九路军抗日将士认为“暴日占我东北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①“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尺，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之变更之目的”。^②甚至连佛门青年弟子也认识到：“当此困难严重，民族存亡之生死关头，不容静坐蒲团，依然闭目参禅。”^③全国各阶层的民众觉醒，集中地反映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上。

日本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使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低潮状态的人民民主运动，在抗日的旗帜下重新高涨起来。沦陷的东北地区各阶级、阶层人民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及其他各界爱国人士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在保卫中华民族的总目标下，各阶层人民的目的、要求和愿望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为民族求生存、争解放的政治潮流。

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大革命失败后政治上一度追随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改变了政治态度。1927年后，在国共斗争问题上，民族资产阶级一直主张“剿共”。九一八的炮声，使得他们在民族危机面前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

① 《十九路军抗日通电》。

② 《冯玉祥就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通电》。

③ 《北京佛教育青年救国会宣言》（1932年1月）。

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①提出“当前中国将整个地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的决心，另辟和平的解决赤祸之路。”^②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同意共产党的主张，但在国破家亡形势下，它们要求停止国共内战，集中国力，共御外侮。同时也是要求国民党革新政治，开放民主，以调动各种抗日力量。这说明，抗日救亡成了他们政治态度的根本出发点。

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国民党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和迫害，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义愤。在南京，举行抗日示威请愿的青年学生砸毁国民党党部，痛打外交部长，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这同在全国许多城市举行的要求抗日的集会一起，表明了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壮大，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段斗争是围绕着民族斗争而展开的。这一斗争呈现的抗日与反蒋统一起来的特点，给抗日民主运动带来了特有的标记和曲折性。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严重分化。从东北的马占山、冯占海、李杜、苏炳文的违命抵抗开始，到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长城抗战、察绥抗战、福建事变以及两广事变等等，表明了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对国民党当权派不抵抗政策的不满和反对。诚然，上述情况各异，但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内部许多爱国人士和官兵，要求抗日救国的愿望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发生尖锐的矛盾，抗命和分化则是必然的。这些事件表明了一个客观事实，不抵抗政策不得人心，抗日则受到支持和拥护。因此，国民党内部分化

①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

② 天津《大公报》，1933年1月21日

的基本特点，是在抗日与不抗日问题上的分化。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斗争，造成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严重危机，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是蒋介石无视中日民族矛盾，一意推行妥协退让政策，同全国各阶级、阶层的抗日要求发生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的结果。

上述事实说明，抗日者得人心，不抗日者失人心，抗日与否，已经成为人们评人论事、褒贬时政的准则，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九一八事变后左右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我们提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

当前否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论点，影响较大的有两个。

有人引用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演讲中的论点，说1935年中日民族矛盾才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说：“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不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姑且把这种观点称为“东北非本部说”。意思是说，日本占领东北，还没有侵略到中国本部，只有侵略到华北，即深入到中国本部，民族矛盾才成为主要矛盾。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和歪曲，第一，毛泽东在这个演讲中指出：“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而且，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也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刘少奇也曾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开始超过阶级矛盾”^①。第二，毛泽东的演讲是在瓦窑堡会议反对关门主

^① 《六大以来》〔上〕第807页。

义的特定条件下，说明党内过去对中日民族矛盾认识不清，使“人们似乎觉得”日本“不一定再前进了”，根本不是说1935年前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第三，毛泽东所说的1935年日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这只是一种习惯用语，并不意味着中国东北不是“中国本部”。因为，在今天有意无意强调东北非本部说，实际上是把东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领土未作同等看待，因而忽视了九一八事变的严重性质，而认为只是“地方事件”。这种说法从历史上看不符合实际，从现实上也许正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欢迎。对此，中共中央文件也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如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曾指明：“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本部各省（东三省在内）经济上绝无根本的不同”。

综上所述，我们对那种把东北划在中国本部之外，认为日本占领东北还不能构成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因而不把中日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观点，是不能同意的。

关于反苏战争问题，在1931年后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的许多决议中，都认为日本侵略东北是“发动反苏战争”，或称之为“反苏战争的序幕”。直到目前，苏联史学界的许多论著，仍然一再强调日本攻占中国东北，是为了发动反苏战争。国内的某些论著，也有夸大反苏战争的危险的倾向。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想侵略苏联，这是事实，但是，一直未把对苏联作战作为第一目标^①。这一点从1932年至1936年间日本对苏的军事部署看得非常清楚。日本和苏联在远东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如1931年9月日、苏远东兵力数字比例是3：7；1933年则是4.5：9.5；1935年则是5.5：17。日、苏在远东配备的飞机数字比例则是：1931年为90：200；1933年为90：350；1935年为90：950。^②

① 参见森三郎：《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中译本〕第41页。

② 参见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第227页。